

在历史 与叙事之间：

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研究

彭冠龙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在历史 与叙事之间：

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研究

彭冠龙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陈艾婧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与叙事之间: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研究 / 彭冠龙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14-8792-1

I. ①在… II. ①彭… III. ①小说创作—文学创作研究—中国—1946~1952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391号

书名 在历史与叙事之间: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研究

著者	彭冠龙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14-8792-1
印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3.75
字数	83千字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本书是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虽然没有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但这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步，我珍视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一股重要却被简化的创作潮流	(21)
第一节 重寻被遗漏的作品	(21)
第二节 土改小说的两种类型	(26)
第三节 “政治之力”与土改小说创作	(33)
第四节 作家思想改造与土改小说创作	(38)
第二章 土改小说创作模式和文学思维	(47)
第一节 “分田分地真忙”模式	(48)
第二节 “邪不压正”模式	(56)
第三节 “二元对立”的文学思维	(63)
第三章 生活、政策、艺术：土改小说创作的三个 维度	(69)
第一节 土改小说源于“生活”	(71)
第二节 重审“政策”与土改小说	(79)
第三节 场域环境下的土改小说创作	(85)
结 语	(90)
附录一 土改小说篇目汇总	(92)
附录二 关于土改小说创作的讨论	(99)
参考文献	(102)
后 记	(112)

绪 论

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颁布,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在解放区展开。随着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土地改革运动逐渐向新解放区蔓延,最终,这场运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全国的解放在全中国普遍展开并取得胜利。对于这场运动,大批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员”直接参与其中,并以小说的形式反映着自身亲历的土改过程。从1946年到1952年,公开发表的土改小说数以百计。由于这场运动时间跨度长、过程复杂、意义重大,对其进行叙事的土改小说创作极具丰富性。

一、研究现状分析

对于这样一股巨大的创作潮流,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分为同步的时评、当下的研究、史书的记载和港台及国外的观点等四类,这四类成果有相通之处,但也各有特色。通过对这几类成果的梳理,可以呈现土改小说研究的面貌与优劣。

(一) 同步的时评

土改小说创作潮流伴随着土改运动而来,对土改小说

的研究伴随着这股创作潮流而起，这些同步的时评构成了对土改小说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对土改小说的研究实际上等同于对《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部小说的研究，另外，偶尔会涉及对土改小说创作方法的研究。

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和相关史实，基本可以推断土改小说研究开端于对《暴风骤雨》的研究。这一研究始于刊载在1948年2月23日《东北日报》上的一封书信，落款为“霜野”。而这封信明显是一个“从来也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和批评过谁的东西”的人写的，虽然提出的问题细致入微，研究得非常仔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总体观点。^①

之后，更多知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开始对《暴风骤雨》进行评论。最能代表当时研究者整体观点的一篇文章是陈涌发表在1952年6月25日《文艺报》上的《〈暴风骤雨〉》。这篇文章从分析人物形象入手，通过对赵玉林、赵大嫂和萧祥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分析，认为“整个来看，《暴风骤雨》的人物是比较单纯的，整个作品的情节和结构也是比较单纯的，也因为这样，它比较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把握”^②“但是，在语言方面，作者在吸收群众语言时，也采用了一些使别处人难以理解的不必要的方言”。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指出了整个《暴风骤雨》在反映土改运

① 霜野：《霜野来信》，载《东北日报》，1948年2月23日。

② 陈涌：《〈暴风骤雨〉》，载《文艺报》，1952年第6期。该段落引用均来自此文献。

动方面存在的一个“本质缺点”：“对于生活的热情和敏感，对于新人物的美好的品性的加以表扬以及艺术上的单纯性……使《暴风骤雨》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不充分的。”这一定论充分体现了当时文学研究领域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土改小说研究的影响。

另外，当时对《暴风骤雨》进行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有《推荐〈暴风骤雨〉》^①《我读了〈暴风骤雨〉》^②《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③等。除这些研究者的评论文章之外，1948年5月还召开了一次“《暴风骤雨》座谈会”，周立波、宋之的、草明等人参加并发言，提出了各自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摘要发表在1948年6月22日的《东北日报》上。

相对来说，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研究稍显滞后，而且同时代的评论文章也较少，但这少量的评论文章却都篇幅较长，分析得更加深入。

1952年5月25日，《文艺报》发表了冯雪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一文。与陈涌的《〈暴风骤雨〉》一样，这篇文章也重在分析人物形象，但其立足点更高，没有就作品论作品，而是站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的高度来分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学史意义，指出了其反映土改运动方面的“一种精神”和整

① 芝：《推荐〈暴风骤雨〉》，载《生活报》，1948年5月11日。

② 韩进：《我读了〈暴风骤雨〉》，载《东北日报》，1948年6月22日。

③ 蔡天心：《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载《东北文艺》，1950年3月15日。

部作品的“三大成就”。“一种精神”即“作者写人是为了写斗争，也就是为了写社会或写生活；就是说，写人是服从于写社会或写生活的目的，在这里，就是主要的服从于写农村阶级斗争的目的”^①。“三大成就”即“第一，从对于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深入的观察、体验与研究出发，对于社会能够在复杂和深广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和比较全面的分析……第二，从写真实的生活和社会的要求出发，对社会的内在的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同时也这样地分析人的思想与行动及相互关系……第三，艺术的表现能力已达到相当优秀的程度”。根据这些主要观点，结合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陈涌对《暴风骤雨》“本质缺点”的批评，还是冯雪峰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种精神”和“三大成就”的肯定，都是围绕一点进行的，即是否写出了土改运动中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更加凸显了当时文学研究领域意识形态色彩在土改小说研究中留下的深深印记，这一印记即使在我们当下的研究中，也时有体现。

除冯雪峰的评论之外，当时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研究文章还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②，以及稍晚一点的《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③等。

①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载《文艺报》，1952年第5期。该段落引用均来自此文献。

② 陈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载《人民文学》，1950年9月1日。

③ 竹可羽：《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载《人民文学》，1957年第10期。

关于土改小说创作方法的研究，主要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其目的并非单纯地进行文学研究，而是普遍带有号召作用。研究者都试图通过对土改小说创作方法的讨论，来号召作家“组织起来，参加土改，反映土改”^①。

1951年12月《西北文艺》刊发了胡采的《写土地改革》。该文系统地论述了土地改革题材作品的创作方法，可以说是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研究者的普遍观点。文章首先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是在毛主席政策指导之下，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有步骤有计划进行的”^②，而不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为了让农民翻身而进行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小说创作“主要的应该是歌颂”，而不是“暴露”。然后，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歌颂什么”的问题，提出要“歌颂党的领导”“歌颂农民群众的觉悟和团结”，以及“歌颂群众斗争和斗争的胜利”。该文的论述几乎不带号召色彩，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其他讨论土改小说创作方法的文章还有《围绕土地改革，开展创作运动》^③《参加土地改革，正确的反映土地改革》^④等。另外，林冬白于1950年主编了一本《土地改

① 中南区第二次文艺工作会议代表：《组织起来，参加土改，反映土改——给全区文艺工作者的公开信》，载《长江文艺》，1950年第9期。

② 胡采：《写土地改革》，载《西北文艺》，1951年第12期。该段落引用均来自此文献。

③ 熊复：《围绕土地改革，开展创作运动》，载《长江文艺》，1950年第10期。

④ 刘仰桥：《参加土地改革，正确的反映土地改革》，载《西南文艺》，1951年第11期。

革与文艺创作》论文集，收入丁玲、王力、希坚等人的研究文章共七篇，大量内容涉及土改小说的创作方法。此外，中南区文联于1950年专门召开了“土改创作座谈会”，对土改题材作品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深入研讨，《长江文艺》记者还撰写了《关于土改创作的一些问题——记中南文联筹委会土改创作座谈会》一文，发表在1950年8月的《长江文艺》上。

整体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原因，第一阶段的土改小说研究是与土改小说创作和土改运动同步并行的，其突出特点是研究范围小、研究对象集中、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实际号召作用显著，其成果配合了政策主题，在社会运动领域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但正是由于上述特点，导致了这一阶段研究的一大不足，即深度不够。这一时期的土改小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文学而进行的，其目的首先是为政治服务，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这种情况或许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延安文学理论造成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1946年至1952年的土改小说创作潮流，本身就是笼罩在延安文艺理论这一巨大罗网之下去主动配合社会政治运动的，对这种作品的研究，似乎也只有采取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方法才贴切。如此看来，这一时期土改小说的研究状况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或许正因如此，在研究中断了30多年后，当下的研究者再次关注那个时期的土改小说时，当时同步研究的很多观点才会被一直沿用。

（二）当下的研究

与第一阶段的土改小说研究特点正好相反，当下研究

的特点是范围广、对象趋于繁复、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为文学而进行研究。对土改小说的研究之所以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又一次大量出现，比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第一阶段的研究一样，当下的研究仍然存在大量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具体作品也仍然以《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主，但是这些研究并不像第一阶段那样仅仅是通过简单的文本分析得出一个与政治有关的结论，而是进入文本叙事的深层，进入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研究更加深入、宏阔。

为纪念丁玲一百周年诞辰，200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丁玲的一篇佚文——《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从这篇佚文出发，严家炎撰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将佚文与其长篇小说的创作及出版过程中的曲折经历相联系，对其体现的作者创作个性作了较为具体扼要的分析，证明了它仍具有丁玲作品一贯的大气和锋芒。前文已经提到了冯雪峰指出的该部作品的三大成就，而严家炎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了三大成就，即“以接近原生态的方式反映现实，以相当生活化的笔墨来写土改，看重生活本身的逻辑”“是敢于写出土改工作本身的种种曲折和人物命运的乖异多样”和“体

现出对人的关爱，显示了较多的人情味”。^①如果把这两个人的观点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其差距之大，这种差距折射出前后两个阶段土改小说研究的整体差异，即由视土改小说为政治的附庸变为真正把土改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另外，作者通过相关材料的独家披露，澄清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何以能获得斯大林文艺奖这一在文学史上经常引起猜测和遭致误解的谜团：“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其研究的历史深度和文学史意义可见一斑。

在对《暴风骤雨》的研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周彩霞2010年的一篇硕士毕业论文《〈暴风骤雨〉再研究——人类学如何回访文学作品》。这篇毕业论文的特色在于，虽然整篇文章是在研究《暴风骤雨》这部文学作品，但是所用的方法、采取的视角完全属于社会人类学，这反映了当下土改小说研究的跨学科倾向。通过回访，作者核实了作品中的人物及故事情节，包括作品中哪些人物和情节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假参半或有拼接情况的等，这些成果也有助于对《暴风骤雨》的进一步研究。

除以上列举的文章外，当下对《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两部作品的研究成果还有：《“宏大叙事”

^① 严家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该段落引用均来自此文獻。

中的细节瑕疵》^①《革命经典中的惩恶扬善和阶级外衣》^②《谁是丁玲的“影子”——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③《土改的两张面孔——〈暴风骤雨〉、〈故乡天下黄花〉叙事比较》^④《略论〈暴风骤雨〉的创作特色》^⑤等。

其次，除对具体作品继续进行研究之外，研究者的立足点开始提高，对土改小说的宏观研究不断增加，这是当下土改小说研究领域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类。在这类研究成果中，陈思和的《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最有代表性。这篇文章用文史互现的方法，将历史研究领域中有土改运动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与文学创作领域中有土改题材的小说进行对比和文本分析，基于整个土改运动过程和土改小说创作潮流（包括了80年代以后的土改小说创作）讨论了四个问题——“为什么当代文学史上没有表现土改题材的杰作”“作家的难题：如何表现土改运动中的中农政策、民间暴力和干部中的坏人”“作家的困惑例证：土改中的暴力现象与土改小说中的暴力描写”“‘文革’后文学对于民间暴力与痞子因

① 秦林芳：《“宏大叙事”中的细节瑕疵》，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

② 黄曙光：《革命经典中的惩恶扬善和阶级外衣》，载《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

③ 许道军：《谁是丁玲的“影子”——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载《名作欣赏》，2005年第24期。

④ 黄勇：《土改的两张面孔——〈暴风骤雨〉、〈故乡天下黄花〉叙事比较》，载《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⑤ 田美琳：《略论〈暴风骤雨〉的创作特色》，载《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素的反思”。这四个问题本身就极富新意和研究价值，然而，深入挖掘会发现这篇文章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对这四个问题进行探讨的目的——分析文学创作中表现暴力因素的难点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长期以来土改小说创作和研究中存在的根本矛盾：“土改的历史意义与进步宗旨本来无可置疑，但如果真实描写暴力，哪怕是渲染其正当理由，美学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如果完全回避了暴力，也就取消了土改的真实性。”^①这一矛盾是实际存在的，却又从未被指出。也正是由于这一矛盾无法解决，导致了土改小说缺乏杰作，研究也难以深入。

赵璇昆的《在文学与政策之间——20世纪40—50年代土改小说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篇文章探讨了土改小说赖以生存的社会与文学语境——文学“政治化”，进而阐明了在充满政治热情的天空下土改作家们的共同经历，以及这些经历是如何在土改小说中体现的。通过分析，作者指出了土改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它毫无遮掩地显示出国人心中浓浓的原乡情结，它对土地、人、自然的深厚情怀，与乡土小说一脉相承，但从写作模式和写作的主体价值上讲，却更多地与延安文学相关。土改小说开创了一种全力书写政策的文学创作模式，对改革小说等政策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① 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胡星亮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② 赵璇昆：《在文学与政策之间——20世纪40—50年代土改小说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另外，宏观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还有《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①《空间中的“政治”——“土改小说”再解读》^②《浮出地表：土改小说的历史还原与想象》^③《多维文化视野下的“土改”叙事——从解放区到新时期“土改书写”的叙事变迁》^④等。

再次，在立足点提高的同时，研究者的眼光开始放宽，紧盯着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为代表的少数几部主流土改小说不放、紧盯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放的研究状况开始改变，许多成果涉及了各式各样的土改小说和与小说相关的各式各样的要素。

姚新勇、黄勇的《土改、民族、阶级与现代化——少数民族题材小说中的“土改”》研究了反映少数民族地区土改运动的小说，认为这类小说“尽管在土改叙述模式上大致相同，却有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⑤。而出现差异的原因则在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族情：“由于民族地区的复

① 贺仲明：《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② 张玉贞：《空间中的“政治”——“土改小说”再解读》，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③ 李刚、谢燕红：《浮出地表：土改小说的历史还原与想象》，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④ 郑立群：《多维文化视野下的“土改”叙事——从解放区到新时期“土改书写”的叙事变迁》，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 姚新勇、黄勇：《土改、民族、阶级与现代化——少数民族题材小说中的“土改”》，载《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该段落引用均来自此文献。

杂性，奴隶主不仅是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团结、教育的对象。”因此，“同其他土改小说基本以阶级对立建构土改的合法性不同”，这类土改小说“非常强调现代化发展的理由”。

如果说，对反映少数民族地区土改运动的小说进行研究仍然局限于对“正统土改小说”的研究的话，那么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的研究则涉及以往土改小说研究的禁区——对“反动小说”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黄勇的《“真实”的书写？——张爱玲土改小说论》。长期以来，对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存在“真实之辩”，国外研究者多数认为其“真”，而国内则持相反意见。黄勇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局限在“真”与“假”的判断，而是“进入到相关的叙述逻辑中去”^①，通过对“宏观真实”和“具体真实”两方面的讨论，指出“也许与其纠缠于‘事实真实’与否的问题，不如跳出来，换一种思维来看问题”，并通过这种新的思维得出结论：“意识形态的强烈排他性必然极大地限制作家们的自由创作，使其在体制写作和艺术选择之间徘徊甚至迷失，张氏的土改叙事与正统叙事一样，都未能摆脱这种写作上的两难处境。”

对于土改小说相关要素的研究，目前主要涉及“女性形象”“会议现象”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个方面。

^① 黄勇：《“真实”的书写？——张爱玲土改小说论》，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第3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该段落引用均来自此文献。